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符号话语建构¹⁾

彭佳

摘要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将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全面延伸到环境层面，并造成了整体性的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下，现有的环境传播话语不足以克服其内部危机，迫切需要以整合性的概念为基础进行重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这一理念提供了对其进行整合的基础，它具有中国文化的、人类的，以及各个国家与民族文化的三重主体内涵，并相应地形成了总体性、人类主体性和符号主体平等性的符码机制。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指导思想，建构美丽中国话语、地区认同话语和环境正义论下的中国话语，对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环境传播；符号话语；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彭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510632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1]这一指导性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学界人士从不同的学科范畴出发，对其进行了学理上的阐释和讨论，其理论出发点包括马克思主义批评^[2]、中国传统哲学^[3]、伦理学^[4]、话语传播^[5]等。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如气候变暖、核污染、空气和水源污染等问题变得日趋严峻，这些问题引发和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紧张和矛盾。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传播中占据话语主导权，加之部分西方媒体大力渲染“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的环境话语权未能得到充分主张，国际形象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此外，西方主导的环境话语体系本身也不足以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这种语境下，建构中国自身的环境话语体系是当今环境传播研究的当务之急^[6]。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本文以此为指导，探寻如何在符号学的视域中建构中国自身的环境话语体系。

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既有环境话语体系中的出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发言中提出的理念。这一重要理念提出的具体背景，是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危机；但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环境传播的公共修辞与符号化治理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7BWX008）。



其广义上的语境，是环境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全人类必须一起面对的、和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公正深刻相关的议题。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体系迅速地全球扩张，尤其是网络技术提供了将景观式的生活方式进行大量复制的可能，整个生命网络，包括深海与极地中的生命及其活动，都被纳入到这个生产和消费体系、以及对这个体系的媒介化表征中。其次，由于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以及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环境危机问题（如核安全、温室效应、塑料污染等）不再以地方和国家领土为限，而是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主要由西方工业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被转移到经济不发达地区。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所掌控的政治经济体系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的掠夺和破坏，包括垃圾和污染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输出生和转移，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污染行业、快消行业的恶性发展，以及为了能源争夺而制造的战争等。再者，造成以上生态环境危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及其提倡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被西方大众媒体话语体系包装为象征民主、自由、经济发展与个体独立的符号文本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导致发展中国国家和地区在话语和经济的层面遭受到双重的不公正。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均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传播上遭遇了严重的不公。一方面，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遭遇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被普遍地描述为让自然环境“超负荷的”（overloaded）、对其“过度使用”（overused）和“过度开发”（overexploited），甚至被认为是全球资源的寻求和掠夺^[9]。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的不同是当今世界最为根本的主要矛盾，生态、经济、国家安全等问题都是被放置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传播的^[9]，现有环境传播的话语体系背后是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话语作为引导认知意义产生的基本装置，对于人们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如何协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中的责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符号意义生产的角

度而言，要建立新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体系，就必须破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既有的环境话语结构。

所谓“话语”（discourse），是在具体运用中根据语境产生完整语义的语言单位^[10]，它在结构上和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对意义的认知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认为，话语是“行动、语言和交流的组整合方式，表示思考、相信、评价和应用各种符号、工具和物体的方式”^[11]，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符号文本的表征方式。当今的环境传播话语繁复多样，按其基本主张可分为以下九种流派：生存第一主义环境话语、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民主实用主义环境话语、经济理性主义环境话语、可持续性环境话语、现代性环境话语、绿色意识环境话语、绿色政治环境话语^[12]。其具体的议题则主要包括：空气质量、水质、重金属、生物多样性、森林、渔业、气候、水资源和农业发展等^[13]。2019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也成为环境传播的重要议题^[14]。这些议题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且相互深刻关联，然而，根据现有环境话语而展开的批评都存在各种不足，无法有效地推进对环境问题的传播。

按照德赖泽克的观点，对环境话语的现有批评，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5]：（1）生存主义环境话语。这一话语分析认为，环境为某一物种生存提供的空间容量是有限的，中央集权或公民行动是预防其过载的两种方式。推崇集中制法则的学者海尔布罗（Robert Heibroner）、奥福尔斯（Williams Ophuls）等认为，要超越短期利益，寻找共同环境利益需要依靠政府的行动；捷克（Brian Czech）、巴尼特（Richard Barnett）、布朗（Lester Brown）等主张公民的作用，指出作为动员力量的公共舆论在应对环境问题时的效能远超出政府的单边行动。这一话语类型提倡积极的介入行动，但其提倡者要么对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抱有过高期望，要么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和调节对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过分乐观，因此无法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动员。（2）理性主义环境话语。这种话语类型

将环境破坏视为工业发展的消极后果,认为可以借助行政、市场等各种温和的手段实现二者的平衡,其话语类型可分为以扎拉加 (Gus de Zaraga) 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萨贝尔 (Charles Sabel) 等主张的行政理性以及雷利 (William Reilly) 等人支持的经济理性。具体而言,设立自由讨论的公共平台、建立并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或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是这一话语在应对环境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此类话语是一种肯定资本主义的、积极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它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无法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本身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3) 现代主义环境话语。以拉夫蒂 (William Lafferty)、胡伯 (Joseph Huber) 与耶尼克 (Martin Janicke)、德莱泽克 (John S. Dryzek) 等人代表,这一话语批评将其焦点放置于环境保护与社会问题,而非前者将其归因于经济发展。该话语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观点,强调有机协调、可持续发展、绿色生产等,但忽略了全球生态和经济发展中各国有着不同国情,且这种状况是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的,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需要国际上巨大的协调努力才能改变。(4) 激进主义环境话语。提倡这一话语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沃维克·福克斯 (Warwick Fox)、林恩·怀特 (Lynn White) 和艾特肯 (Robert Aitken),他们强调在资本主义话语框架下追求激进的、系统性的环境模式变革,建立起绿色的公共空间以达成环境问题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一话语比较极端,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过于严格和理想化,此类观点在实践运用中成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综上所述,现有的环境话语各有优势和局限性,需要更为先进、更有整体视角和深刻洞察力的理念将其统摄综合:在这种语境之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出场可谓恰逢其时,有力地回应了时代的呼唤。

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符码机制

话语隐性地规定着我们如何思考、评价和运用符码,是人们对符号文本进行编码并进行身份确认的方式。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将人、生命体和自然资源都转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符号,其

交换价值是由资本主义主宰的生产关系、消费逻辑和背后的资本意识形态所操控的。这种基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话语体系建立起来的等级化编码机制主要表现为:(1) 自然和文明的对立与等级化编码。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符号体系中,自然(与“野蛮”、与“东方”)是作为(西方)文明的他者和对立项存在的。西方世界高耗能、高消费的生活模式连同自由、民主等概念被建立为“文明”的符号,而其他文化的生活和制度模式则被边缘化,在价值层面被认为是“落后的”“野蛮的”,和“自然”一起成为“文明”的对立面。(2) 自然内部的等级化编码。根据生物体和人类的亲缘远近程度,生物学的梯形和树形分类模式对它们进行了等级化的编码,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按照生物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有用程度对自然环境进行编码。与之对应的话语体系,是将“原生态”“后花园”等符号建构为“未经破坏/污染因而有健康/经济价值的”“供休憩的桃花源/度假地”等意味着消费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话语,并将其作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加以推广。(3) 文化内部的等级编码。将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接受高低程度作为衡量其“文明度”的指标,接受度越低的文化社会越不“文明”,在西方中心的符号价值体系中排位越低,对其自然环境的伦理考量就越低。西方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危机输出(垃圾输出、核废料输出、高污染行业转移等),是这种等级差异在环境问题上的表现。当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角色分工时,成为全球污染主要产出地的它们,又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环保的话语体系中被批评、指责和拒斥,被要求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以应对全球化的生态环境危机。由于被认为是“不文明的”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往往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在环境保护上的现实困难经常被忽视或低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经常被扭曲或抹杀,在话语层面被“消音”。因此,要建构新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建立指导性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环境话语体系的符码机制。

在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时,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哲学观，是奠定这一根本性的人与自然世界观的基础^[6]。这一理念有三层重要的主体性价值内涵：首先，它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万物相融互构、相生相长的自然观，这一理念将各个生命、各个物种、各个国家和地区放置在平等的位格上，试图打破长久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生态霸权，建构整体的、互动的、和合共生的理念。从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出发对该理念进行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理论建设中的主体性。其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将人和其他生命置放在平等的位格上以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生命个体和各民族、各文化的平等权利；同时承认人对保护和重建自然环境的重要影响，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科技的进步应当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总体福祉应当得到加强，尤其是要“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这就对于纠正极端的生态主义，包括激进环境主义话语的提倡者中部分为了维护“生态正义”而不惜否认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观点有积极作用。第三，它强调人类和各民族、各国家在建立共享的地球自然环境中的主体性和相互依存性：这种对民族和国家在环境保护事务中主体性的肯定，是推动中国的环境传播中积极争取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与上文所说的三重主体性价值内涵所对应的，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所蕴涵的符码机制。首先，这一理念提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因此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8]。这一观点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主义环境话语中有机发展论的精髓，将以总体性的编码方式安置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不是处于对立的二分制符码机制中，而是以一种内生的、有机的相互融合的方式被安置在总体的命运共同体之中。其次，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理念吸收了现代主义环境话语中的合理部分，承认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作为编码原则，强调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9]，承认人既是环境建造和保护的行动者，又有发展自身的权利。再者，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各主体平等的符码机制规定各符号主体的地位，提出要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石应对全球气候问题，这不仅肯定了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性作用，还触及到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不平等的本质。《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提出的“六个坚持”，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显得尤其意义重大。多样、多边、共同责任原则意味着符号主体的对话性和价值意义上的平等，而责任的区别度意味着因为实际结构和发展的不平等造成的符号主体在功能上的差异，而非等级上的差异性。符号学研究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结构的透视可以从话语切入，因为“所谓的非话语性复合体，机构、技术、生产组织等……对象间的地位差异构成了它们自身简单或复杂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并不一定由构成性的外部系统形成，因此只能被看做话语表达”^[20]。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试图建造新的平等性的命运共同体，暗含着总体性、人类主体性和符号主体平等性的符码机制，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环境话语的故事情节开始于将人和其他生命体、将各个国家和地区放置在平等并相互联结的位置上，希望推动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但另一方面，强调要以环境友好和正义为定向。德莱泽克认为，话语分析的四大要素包括：被承认和建构的基本实体、对自然关系的假定、施动者与其动机、以及关键隐喻和其他修辞手法，话语的故事靠这四大要素实现^[21]。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建构的中国环境话语承认并强调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同时如可持续性话语那样，强调一个类似于网状或巢状的从全球到地方的实体系统，而在对自然关系的假定中，否认等级化、阶序化的关系，提倡人类主体和万物共生

的模式。由于强调共同体的整体合作，其施动者是多边协作者和伙伴模式，动机是共同利益和命运；它将共同体各要素共构的环境视为有内在规律的复杂生命系统，其关键隐喻是有机体，修辞手法是伦理性的。下文将从话语建构的不同层面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的环境话语建构

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三重符码机制为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环境话语进行整合性的建构。

（一）美丽中国话语的建构

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文化/自然”两分话语不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自然万物共生的美学理念，以“美丽中国”的话语在全媒体语境中进行传播文本的建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立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可以说，‘美好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相契合，与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适应。”^[24]吴文盛将“美丽中国”的建造目标分为三重境界，分别对应建设中的基础性目标、中间性目标和最终目标：这三重境界分别是自然生态美、生态文明美和美丽强国^[25]。这说明万物和谐共生、自然与文化交融发展的理念，内在地融贯于“美丽中国”的建造话语之中。从以《美丽中国》为起点的系列生态风光纪录片中山水美学的表征到精神象征的凝聚，到“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全媒体新闻和短视频中的田园隐喻塑造和绿色话语表达，“美丽中国”的话语在语言、视觉和听觉的媒介形态上充分地展现着万物相互交融、人与自然相互交融、自然与文化相互交融的生态世界与生活图景。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美丽中国”的话语在符用功能的层面对推动环境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通过对中国自然环境中典型的象征符，如竹子、熊猫、白鹤、梅花等的复义使用和大量传播，将其建立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情感和认同的视觉符号，将对自然、传统美学和民族文化的热爱凝为一体，起到了锻造共有的自然美学、集体记忆和家国情感的作用。其次，它包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蕴，起到了号召民众成为环境保护和爱国运动的积极社会行动者的作用^[26]。再者，由于《美丽中国》纪录片本身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在国际传播中，“美丽中国”已经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名片，是推动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理念和当代故事“走出去”的积极话语资源，以此为主题组织和讲述中国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保护故事，有利于破除西方部分媒体造成的关于“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刻板印象，促进海外受众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接受。

（二）地方认同话语的建构

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同质化和单一化，如蒂莫·马伦（Timo Maran）所批评的：“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化语境的同一化。地方之间的自然环境无疑是有所差异的，而同一化的过程使得人对于地方性的自然符号的适应性降低了。……大众媒体一直试图减弱地方文化和地方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文化同质化这一全球化的先决条件才能出现。”^[27]“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强调共生、强调多样性的重要，这就在看重人类与其他生命之整体性的高度上同时赋予了环境话语建构地方性、本土性的视域。在绿色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和保护地方环境的关系上，这种对本土生态、尤其是对本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显得尤为重要。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美丽、清洁的世界。”^[28]而要维护自然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维护生态安全屏障，就需要尊重各地自然传统，对各地本土的生态环境和地方文化进行协同保护，并将传统的自然生态观和文化观进行当下的叙述与重构，



将珍惜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传递到每一个个体。

要建构对生态环境的历史叙述,“本土依恋”(local attachment)和“本土认同”(local identity)的话语对于唤起人们对周边环境的保护意识,尤其是对于促进人们参与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保护周边生物多样性、垃圾分类、节能活动等的意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欧布莱恩(Elizabeth A. O'Brien)的研究表明,在佛蒙特州的“本土认同”话语建构中,有四种主要的话语在相互作用,分别是“自然森林”(the natural forest)话语、“可休闲的森林”(the recreational forest)话语、“生产性的森林”(the productive forest)话语、“依附性的森林”(the dependent forest)话语,它们交织互文,通过对枫树、落叶、滑雪、农场和森林景观等典型视觉符号的塑造,表达了佛蒙特州人强烈的地方依恋感和认同感^[27]。与之相似的是,这种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我国各地的文化中,为地方的生态保护提供了积极的话语资源。地方的植物文化、尤其是民族植物学的知识,能够为地方认同、为提高民众维护当地公园、湿地生态环境的意愿,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28]。例如,《大理日报》遵照习近平总书记保护洱海的嘱托和批示,开设了《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攻坚战》《清洁家园 清洁水源 清洁田园》《讲个洱海故事给你听》等20多个有关生态文明、洱海保护治理等内容的栏目^[29]。通过对个体故事的讲述和记录,包括对当地人民积极参与保护和建设洱海的事迹进行积极宣传,作为地方媒体的《大理日报》凝聚了公众关于洱海的地方记忆,形成了环境传播中的地方认同话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环保意识的发展。我国作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多民族交融生活的实在的共同体,在各地文化的生成中融铸了各民族保护自然家园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将这些历史记忆转化为地方认同的话语,有利于推进各地民众对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并提高他们参与地方环境保护实践的积极性。

(三) 环境正义论下中国话语的建构

在面对需要多国、多地区共同治理的环境问题时,旨在促进各国政府和机构协同治理的环境

多边主义(environmental multilateralism)本应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往往被要求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因此,后者在面对国际霸权主义、面对北半球对南半球国家的系统性剥削时,强调用“环境正义”来保护自身本来就更为脆弱的经济和生态环境。在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中,环境问题经常被用作借口和工具来维持全球不平等分工的现状,将盘剥性的殖民体系永久化^[30]。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在1992年里约举行的地球峰会上指出:“显然,北半球国家希望在贫穷的南半球国家的森林管理问题上拥有直接的发言权,而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他们所付出的微薄代价远小于穷国的收入损失,还被视为一种慷慨的让步……然而,贫穷的国家并不是在要求慈善,(而是)要求我们在公平的基础上合作。”^[31]这一讲话深刻地指出了在环保问题上实施国际合作的困难之实质:遗留的历史性不公和现有的不平等政治经济格局,影响了环境正义的实现,环境多边主义也因此无法实际推行。

在考量环境正义的话语重构时,如何建构中国自身的环境话语体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产生的价值观体系和不同原则,关于正义论争的话语可以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功利主义话语,强调政策的公平性和正确性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为尽可能多的人口确保了最终的利益,体现的是结果主义伦理,忽视对弱势成员和少数群体的保障;二是社群主义话语,认为正义的正确原则只能根据文化背景和与所涉对象相关的特定理解或价值观来确定,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因此很难在国际合作中展开;三是平等主义话语,强调所有成员的平等权利和对弱势成员的照顾,主张在全球公共资源的使用中,补偿那些过去被过度剥削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四是需求满足话语,主张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基础上分配社会的利益和负担,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32]。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面对经济利益和环境责任的再分配时,如果提倡前两种正义观,就无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和环境格局,无法真正有效地达成国际协作。而作为“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 的环境传播,就是要增强对西方化的和/或工业化的文化盲点和傲慢的意识和批判^[5],以话语重建的方式建构新的环境正义。就这一点而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所提出的环境责任话语是在环境正义论的框架下建立中国环境话语的重要尝试。在2020年9月30日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全球环境治理合力。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是环境治理的相关法律基础,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成果,得到各方广泛支持和参与。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单边主义不得人心,携手合作方为正道。我们要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国际规则尊严和权威,提升全球环境治理水平”^[6]。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反对,对环境正义、国际多边合作、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提倡,是我们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而提出的重要合作准则。正是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提出了“绿色丝绸之路”的发展方案,携手“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并根据各国排放强度与能源结构差异提出差异化减排路径。以环境责任话语为基础提出的差异减排“中国方案”,充分显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环境保护之间的衔接意愿和公平考量,塑造了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国际合作中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国家形象,为国际关系视野中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指明了应有的方向。

四、结论

就如麦尔斯汀 (Tema Milestein) 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环境传播关注的是“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和我们日常生活的、长期的互相依存”^[5]。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其他生命体和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是休戚相关的:垃圾归类、能源使用、对塑料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消费、废气排放等等,都影响着按照自身内部规则运转的生态系统,而整个生态系统反过来影响着所有人类的命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跨物种、多国家和民族

的高度,揭示出生命之间是紧密相依的,对于整个地球的共同命运,任何国家、个体和物种都无法置身事外;而人类作为环境保护活动的主体,作为建设环境的主体,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地球的未来。这表现在,首先,人类和其他生命的深度关联是按照复杂的有机系统内在的结构和规律运行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依存不一定是直接的,结果也不一定即刻可见,但隐性地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和因果关系:譬如,引起全球经济严重损失的新冠疫情,其根源就很可能来自于人类活动对其他物种栖息地的破坏^[6]。其次,这种关联性还表现在,虽然所有个体和国家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命运中都概莫能外,人人有责,但个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不均等。就如在新冠疫情中受到更严重损害的是经济更为脆弱的群体和国家、地区那样,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系藉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在经济和自然环境上付出更大代价的是相较而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需要重新建构环境传播的话语,需要在国家建设、地方保护和环境正义构筑的维度上去重建环境话语,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导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话语体系,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担负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
- [2] 于天宇,李桂花.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研究:渊源、内涵及实践价值[J].南京社会科学,2019(5):1-8.
- [3] 何永强,田云刚.“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解读[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1,33(9):31-35.
- [4] 张敏,胡建东.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的哲学基础及现实指向[J].学术探索,2019(7):12-17.
- [5] 王琪.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与建构路径[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20(2):96-102.
- [6] 蔡东伟,李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知识话语传播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22(3):239-242.
- [7] 李玉洁.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136-140.
- [8] Lei, Z., Arthur, P. J. M., & Sonnenfeld, D. A. The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J]. *Environ-*



mental Politics, 2007, 16(4): 659-668.

[9]邵发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7(4):1-8.

[10]张德禄,刘汝山.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8.

[11]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M].杨炳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22.

[12]刘涛.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0-86.

[13]Bazago, G. F, Guardia, G. M. L., & Garcia, S. J.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in Natural Disaster Scenarios [J].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2020, 33(1): 3093-3107.

[14] Mocatta, G., & Hawley, E. The Coronavirus Crisis as Tipping Point: Communica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Time of Pandemic[J].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2020, 177(1): 119-124.

[15] Dryzek, J. S.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44.

[17][18][19]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1-4-23(2).

[20]苏珊·彼得里利,奥古斯托·蓬齐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M].王永祥,彭佳,余红兵,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379.

[21]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M]. 蔺雪春,郭晨星,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0.

[22]李建华,蔡尚伟.“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及其战略意义[J].四川大学学报,2013(5):135-140.

[23]吴文盛.美丽中国理论研究综述:内涵解析、思想渊源与评价理论[J].当代经济管理,2019,12:1-6.

[24] Wang, J.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and Action Implications of “Beautiful Chin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3,34(4): 143-153.

[25]蒂莫·马伦.地方性:生态符号学的一个基础概念[C]//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编.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

进路.彭佳,汤黎,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158.

[26][34]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5;15-16.

[27] O'Brien, E. A. A Question of Value: What Do Trees and Forests Mean to People in Vermont? [J]. *Landscape Research*, 2006, 31(3): 257-275.

[28]王琛发.地方文化生态之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植物文化与民族植物学的概念讨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0,12:148-155.

[29]辛向东.如何创新宣传手段 做“活”生态文明文章?——以《大理日报》对洱海保护治理的宣传成效为例[J].城市党报研究,2021,3:81-83.

[30] Benton, 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Reconciling the Irreconcilable [C]// In Dobson, A.(ed). *Fairness and Futurity: Essays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199-229.

[31]Mohamad, M. Statement to the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1992, 22(4): 232-234.

[32]Okereke, C. Global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tra-generational Equity and Conceptions of Justice in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Regimes[J]. *Geoforum*, 2006, 37(5): 725-738.

[33] Milstein, T, Mocatta, G.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Global Transformation: An Ecocultural Approach [C]. In Yin, J. & Miike, Y.,(eds.) *Handbook of Global Intervention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22.

[35]Milstein, T., Castro-Sotomayor, J.(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cultural Identity*[C]. London: Routledge, 2020:xviii.

[36] The Guardian. “Tip of the iceberg”: Is our Destruction of Nature Responsible for Covid-19? [EB/OL].<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0/mar/18/tip-of-the-iceberg-is-our-destruction-of-nature-responsible-for-covid-19-aoe>.

Semiotic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n the Idea of the Life Community of Man and Nature

Peng Jia

Abstract: The life comm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exposition by Xi Jinping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socialist thou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s Western Capitali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extends ecological exploitation and injustice to the whole world, wester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cannot transcend its own limitations and needs a new integrative idea as a foundation to reconstruct itself. The idea of life community of man and nature breaks the binary opposition as it connotes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Human beings, and national and ethnic cultures, and accordingly forms a semiotic coding mechanism of globality, anthropic-subjectivity and equality of semiotic agencies. Taking it as a guiding idea, we can re-construct Beautiful China discourses, local identity discourse and Chinese discourse in the theoretic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refore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globe.

Keywords: the life community of man and natur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semiotic discourses; globalization

Author: Peng J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